



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丛书

胡征论

张克勤 魏碧雯 廉文激 张鸿才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诗人胡征，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他的一生与诗为缘，经历坎坷。

早在 50 年代初，当我们步入文艺界不久，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以崇敬的心情，读过他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构思新颖、气势磅礴、富有才华的史诗，给我们年轻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正要进一步研读他的诗歌时，一场政治风暴，使我们却步不前。相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方知他是一位老延安，也是七月派的著名诗人。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刚一燃起，他便告别了故乡和亲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入了党，成为战斗诗社的一员，潜心从事诗歌创作。40 年代初，经周恩来副主席之手，将他的诗作带到国统区重庆，由胡风加了按语，发表在他主编的《希望》诗刊上。这一经过当代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人物结成的诗缘，揭开了胡征富有悲剧和喜剧色彩的人生的序幕。“七月派”作为新诗歌史上一个进步的流派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于是胡征便和其中绝大多数成员一起，经历了历史的磨难，成为中国文坛大冤狱胡风集团的分子之一，从而便有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审查、监禁、失去人身自由的不幸与屈辱。这样的人能挣扎地活下来已经不错了。但我们在去年 5 月的一个下午，真正拜访他时，和我们促膝交谈的竟是一位衣着朴素、面色红润、思想敏锐、谈吐风生的老人。他不但没有丝毫悲天悯人的愁苦之感，相反他为筹资出版早已写好的几本书稿，冒着酷暑严寒扶杖奔波，倒有一种“烈士暮年”的英雄气概，不禁使人油然而产生敬意！

和胡征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他的人品、诗品、文品便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感受。他胸怀坦荡，为人赤诚，从不趋炎附势，少世故，多稚气，是位富有见地和棱角的人，即使身遭厄运，也不改变初衷，从不动摇对真理、对生活、对人性至真、至善、至美地追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高尚人格。他的诗是他高尚人格的写照。质朴清新，不乏战斗豪情。

胡征从8岁赋诗直到年逾古稀高龄，对诗歌依然十分钟情，即使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他也用心泣，用血泣，绝不停止对生活的咏唱。他曾说：“对于我，诗就是人生，战斗的人生。”在被称作“美学的皇冠”的《诗的美学》一书中，胡征独辟蹊径，剥离了伪诗、伪美，烛照出真诗、真美；这是他把多年来的创作经验上升到理论的结晶，融情于理，揭示了美学的真谛。

现在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收集了对胡征平生为人、为文的评论性和记叙性文章。文中的作者，多是他以文谋面的新老读者和评论家。他们的文字自有其清新、朴实的一面，娓娓道来，似乎在引导你去结识一位文坛宿将。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与胡征同遭磨难的战友的评论与记述和书信往来，最可贵的是有胡风先生50年代初给胡征的亲笔信，并有七月派著名诗人鲁黎、牛汉、冀沔、曾卓、罗洛、邹荻帆等及九叶派诗人兼理论家唐湜等人的文章。这些都是朋友间的“密语”，是诗人间坦诚心声的表露，情深意长，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愿所有翻开此书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去认识、理解、评价诗人胡征和他所经历的那段苦难的历程！

编者

1993年3月于西安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辑 严师挚友

胡 风	致胡征	(3)
附:	胡征 怀念不已之情	(7)
鲁 黎	阳光篇	(13)
牛 汉	圣洁的容颜	(22)
曾 卓	读《白衣女》	(23)
冀 沅	《胡征诗选》读后	(26)
罗 洛	寄大雁塔边的诗人	(31)
卢 甸	入海求珠	(35)
附:	胡征 求珠人语	(37)
邹荻帆	与友人谈诗	(39)
洪 桥	男性交响乐	(42)
屠 岸	时代激情的冲击波	(46)
莫 元	诗人胡征印象记	(48)
闵抗生	胡征的“灯”	(53)
吴子敏	精致的哲理	(55)
郁 梅	朴实与豪放	(57)
洪增寿	胡风与胡征	(58)
秦 歌	读《胡征诗选》	(61)
克勤、碧雯、文澄	诗人胡征忆延安	(63)
平志君	给胡征的信	(67)
沙 陵	人生之谜	(69)

第二辑 霹雳论坛

廉文澄	胡征与七月诗派	(75)
-----	---------------	--------

魏碧雯	青春的脚步 战斗的豪情	(88)
张鸿才	刘伯承用兵的生动写照	(101)
刘扬烈	胡征论	(112)
胡义成	老兵的情 新诗的美	(125)
唐 湜	霹雳的声音	(148)
附:	张禹致唐湜	(162)
张鸿才	胡征论	(164)
洪 桥	战歌·奔马·诗人	(190)
双 虎	老兵唱新诗 丹心成花香	(195)

第三辑 诗美思辨

余树声	《诗的美学》与美学的诗	(211)
王式俭	胡征美学思想初探	(219)
张长仓	自成体系 独树一帜	(229)
任朝第	心灵的交融	(235)

第四辑 古吟拾穗

刘 珂	“腰横万里路”	(241)
屠 岸	读诗札记一则	(248)

第五辑 炼狱一隅

井 频	苦爱，燃烧的诗魂	(253)
薛 浩	破药箱里出来的诗人	(261)
张淑琴	我鼓足了勇气敲门	(264)
冷 梦	苦难的一代风流	(270)

卷 三 被俘的随军记者

(第一章第二章略)

第三章 战 俘

第四章 铁 窗

第五章 情 债

附 录	(311)
-----	-------	-------

第一輯

严师挚友

辭一

文學

致胡征（二函）

胡 风

—

1950年6月20日致胡征

……诗，今天又读了一遍。作者所写的是真挚的感情，所用的是诚朴的语言，这感情这语言，都可以说是属于人民的。我认为，作者应该保持住这个自信。这在现在，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由于某些原因，有些人很快地失去了这个自信，因而也就什么也不敢写，写不出来了。

然而，诗，总是通过作者自己的爱憎去体验人民底感情，生发人民底感情，体验到潜伏的深度，升华到综合的高度的。在这一点上说，你是也有的，然而，不强，停留在某一限界上，踌躇着不敢让感情突奔出去。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朴素，是好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民底感情是一个奔腾的海洋，朴素如果成为一种拘谨，那是会减弱感应的突击力量的罢。

从这里，语言底朴素似乎也可以有更生动的色彩，在语汇上和旋律上似乎都可以更活跃起来的。

以上只是一点笼统的感想，这不是（绝对不是）对于已有的作品的否定，而是对于向前追求的一点看法。

学习惠特曼，但还要加上一句，过渡到学习马雅珂夫斯基。把人民底感情汇合到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感觉高度。而这，是要集中在诗人自己的身上的。而这，是要通过民族的人民的语言，但

同时又是要用诗人自己的情绪感觉去感应过，燃烧过，重新组织过的语言。我认为，要这样，我们才不会做民歌民谣底俘虏，而又能把它们底精华吸收进来，消化成我们的养料。

对于诗的前途，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与日下流行理论距离太远，一提出就要弄得哇哇叫的。

……书名，我觉得《打水人》可以的。《石像》或《主席台》似乎也可以用。

另外，偶然注意到了的几个小问题：

一、语言上偶有不自然之处。《打水人》中，“振颤着夜”，似可以说得更自然些。两个“绞动着”，如改为“绞着铁轴”，也许更自然更有旋律些。这不过是我觉得如此，而且是例子。《我回来了》中的“埋伏着”，似乎可以有更合适些的说法。

二、《白衣女》结尾处，情绪是模糊的，甚至有消极的感觉。

三、“撑”字是不是“挣”字？

四、“刻出这个时代的花纹”，似太模糊。“刻出这个时代的声音，把它们送到人民的心里”，例如如此，也许明确些。似不必拘泥于“刻”字。

五、《五月的城》，我认为好的，但说不定会有人当作小资产或个人英雄主义来扬威的。或者把打酒那一节（两句）删去罢。

六、《战汤阴》，并没有写出内容来，但别人反而要欢迎它的。

七、《槐树下》、《蜂王》，大概要受欢迎。但在作者自己，似应认识它们并没有真正写出活的内容，在情绪上和语言上都是被动的。

……

〔注〕：信中所提各诗均在胡征诗集《主席台》中，此集曾于50年代初先后由西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

1950年9月1日致胡征

……诗读过，我觉得那封信等于一通官话，连形式主义都说不上……

“主题不明确”？恰恰相反，作者是被战争这个主题束缚住了，不能从生活感应和对于具体的人的感情出发，去从一角来透出这个战争底活生生的内容。

“没有相互关联”？这更不成话。应该说，太“联”了，感情几乎是一个，是同一个感情写出的不同的、发展着的战争行动。弱点恰恰在这里。

我以为，弱点恰恰和他说的相反。我以为，这诗底创作方法是走不通的。没有从具体生活的感受出发。把具体的感情胚胎一下子膨胀到一般的感情表征上面去了。我觉得，诗人一定抱有许许多多隐隐约约的、从生活得来的感情的胚胎，但你没有宝贵它，没有培养它，却去抓一般的感情表征，追求一个气势，结果都成了空的了。诗人自己能有一种满足，因为他心里有感受的底子。

《红酒》，不是不该写俘虏，正是应该写，因为解放战争底主要人力是从这补充起来的，因为这尖锐地表现了中国革命底阶级内容（农民战争）。问题是没有写出一个有具体的感情内容的活的俘虏兵来。

诗人应该通过被生活斗争所形成的自己的情绪感觉去拥抱对象，感觉对象。对象无论是事件、自然、人物，就会以它自己的特征和你相溶合，现出它自己具体的情绪感觉来的。

以《王克勤》为例，你所写的，可以换写另一个战斗英雄底名字，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用诗人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他（这还

是要通过隐在后面的诗人自己的感受的)，都应该会站出一个活在具体的活生生的情绪特征里的王克勤的。

看罢，“留不住我们”那四行，正是好诗，要说“深度”，那才是写出了“深度”的。那唱出了千千万万人的感情，然而却又是具体的。但当然，如果全首诗都表现出了具体的情绪感觉内容，那它们就会更有力量。

排句没有得到力量，我以为，根本原因在这里。

我以为，第一首是好诗，它表现出了一个集体行动（历史行动）底具体的情绪感觉，我怀疑后面的写法是受了这一首底影响，但实际上，诗人在后面是应该追求这个集体行动底下的具体的隐微的东西的。但我建议：六、七、八节，每节第二行“我们是”三个字取消，十节第二行“我们带”三个字取消。

我也说，“以上意见，未必全对”，写给你作为以后三首诗进行时的“参考”。我希望你直率地告诉我你的意见。我诚恳地希望：我的意见不会影响你的创作情绪。相反，我觉得也许可以提高你的创作情绪。

（注）：信中所谈诗稿，是《七月的战争》，此诗原寄《人民文学》，没发表。胡征同志将诗稿及退稿信一起寄给了胡风。

原载《胡风论诗》·花城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

〔附〕 怀念不已之情

——和胡风同志第一次见面的忆念

胡 征

50年代初，我在重庆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

1951年夏，我忽然接到胡风同志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已来到重庆，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招待所，让我去见见面。我兴奋异常。当时正开会，请假未准。过了两天我去招待所时，他已下乡走了。幸好他到乡下又来了封短信，说明地址，告诉我将梅志的来信随时转给他。当时，部队领导决定我临时参加中央访问团，赴川北革命老根据地访问，让我负责带领“记者组”。军令在身，时间紧迫，在出发的头一天，我终于到乡下去看望了胡风同志。

这是个盛夏季节。上午，我通知管理排长准备好车子，午饭后出发。这是一条丘陵地带的等外公路。美制的越野性强的吉普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小镇上。离村还有五里，路小石多，不通车。于是只好让司机在镇上等着，我徒步前进。终于在一个不大的村子边上找到了他的住处。一个光脊背老汉，头上缠着厚厚的“帕子”，胡楂儿密茂，这就是通常被尊称的“贫农老大爷”了。他热情地把我领到胡风的房廊下，指着没装玻璃的窗子说：“朗格儿就是的。”我急步跨到窗前喊道：

“胡风同志！”

胡风应声出门，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名：

“我是胡征！”

“知道，知道！”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篱笆墙小屋。一张单人凉床，一张旧课桌，一把年代久远的高靠背木椅，两个高低不齐的破竹凳，坐上

去发出吱吱哑哑的音响。课桌上一只缺嘴壶和一只搪瓷水杯。这口杯雪白耀眼，特别醒目，显然是新近加入房间的“舶来品”。我进门见一位中年人在座，大约是村干部，正和胡风商谈工作。胡风让我坐下，他们继续谈。看得出已是尾声，胡风点点头说：

“好，你去找他们摆一摆，晚夕再来，今天晚夕。”

胡风把客人送走，我立起来再和他握手：

“胡风同志，您还是一口湖北音啊！”

他爽朗地大笑：“乡音难改呀，难改！”

我仍然握着这只大手，这只誉满文坛的大手。这只手，从鲁迅手里接过来一面战斗的旗。这只手，扶植、创建了一支诗的大军，也是这只手，指引了我学诗的道路。但我不敢轻佻地走近它。今天，竟然匆忙地走近了它，和它热烈相握。面对着崇敬了多年的这位体格魁梧的慈祥老师，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胡风以老诗人、学者、理论家的敏感，透视了我的心情，轻松地把我按在竹凳上坐下，给我一把破边蒲扇，说：

“天热，宽宽衣服！”

我似乎有点迟疑，他笑着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讲究军风纪，是不是？——不要紧，出门时再讲军风纪吧！”

我把梅志的几封信交给他。没想到，他也交给我一叠信让我看。于是我们各自低头读信。原来，他交给我的是阿垅、鲁藜、芦甸、绿原的来信。信上的称呼，大都是“兄”，“谷兄”、“非兄”、“风兄”，只有芦甸称“先生”。我和胡风第一次通信是1950年，他的地址是路翎告诉我的。1949年，我随军解放南京后，见了路翎。他让我驻地稳定后，给胡风写信，说：“胡风常谈起鲁藜和你。”我给胡风写信时称“同志”，而他却称我为“兄”。我当时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字。在我的心目中，最崇高最亲切的称呼是“同志”，例如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所以，我是按照我的习惯称呼“胡风同志”的。可是自从我第二次写信仍称“同

志”之后，胡风给我写信时则接受了我的习惯。一直到1984年最后给我的信上仍然如此。

读完信之后，他告诉我，这次来重庆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是北京分配他来的。他家仍在上海。不久前，在北京参加学习。当时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学习中都主动报名参加土改。到何省何地，自己也可选择。他选的是四川，到重庆后就被分配到巴县来。

我问：“农村生活习惯么？”

他笑笑：“抗战中，我就是住在重庆市郊农村的。这次等于回到第二或者说第三故乡了。”

我说：“故乡，太好了。完成土改之后，您该写另一部《时间开始了》！”

“不！”他的回答使我惊讶，他肯定地说，“现在不考虑写作。”

“为什么？”我问。

他说：“生活与写作，不是直人直出的。”

我顺势逼他，想让他敞开理论的宝库：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现在是人乎其内，土改之后就必然能够出乎其外呢？”

他说：“王国维的见解，是有美学价值的。所谓‘人乎其内出乎其外’，讲的是创作过程的内在规律。但这话不能解释为一半对生活而言另一半对创作而言。诗不是生活激流的本身，而应该是生活激流的浪花。诗，首先源于生活，紧连着的是诗人自身的‘质’生发出的战斗火花。没有主观战斗精神的搏斗，就没有诗。”

我几乎是“得意而忘形”，又逼过去：

“那么，带着诗的磁石进入生活，不就更易于吸取生活泥土中的诗么？像李贺那样带个诗囊，一路寻诗，随手把零星的诗感记在纸上，丢进诗囊，回家可探囊取诗……”

他拍着蒲扇，摇摇头，离开座位，在簸箕大的空间踱了几步。他没有介意我内心略显不安的跃动（一个闪念：是否问题提

得不伦不类？但立即又自我肯定），他却很冷静：“那是比拟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对诗人的演义化，实质是把诗创作视为文字游戏。我刚才说的进入生活时不考虑创作，意思是：诗人首先必须忠于生活，然后才能忠于诗；而诗，才能忠于诗人。特别是我们的时代生活内容，比李贺时代的生活内容，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仅仅用寻诗觅句的办法，是写不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真诗的。”

我深深盯着他闪光的眼睛，他以平静而又带着挑衅的神情说：“譬如你的《白衣女》，不是从‘诗囊’里掏出来的吧？鲁藜的诗，冀沓的诗，绿原的诗，孙铤的诗，都不是从‘诗囊’里掏出来的！嗯？是不是？”

“是，是的！”我似乎有所悟，但可说不出个所以然，觉得自己仿佛突然开了窍，丰富起来了；而又突然觉得相反，头脑成了个空壳，空得一无所有……我的思绪零乱，还未整理出个眉目，他却皱起眉头盯住我：

“你这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两部长诗（《大进军》脱稿时，抄了两份，一份寄给了刘伯承司令员，另一份刚才交给他的。《七月的战争》出版后早已寄给他了），这是不容易的，值得庆贺的！开国不到两年，你以这样的速度拿出这样规模的诗，这该不是从‘诗囊’里掏出来的？‘诗囊’是装不下的！这长诗，写完没有？”

我说：“没有。这两部只是个开头。第三部题为《大别山上草青青》。重点在第三部。”

他问：“构思了吗？”

我说：“已开始。”

他问：“规模呢？”

我答：“一万行。”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好！”他连连点头，“你应当用这一万行完成一部叙事诗！”

这话碰在我的“痛处”上了。我原来的计划，是完成长篇抒情诗，而不是叙事诗。这时，我针锋相对地和他争辩起来：

“我考虑的仍然是抒情诗，以宏大的规模抒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巨大的激情。自从荷马到歌德、拜伦、普希金、涅克勒索夫，已为人类完成了叙事诗的使命，而大规模的抒情诗呢？……”

他肯定地回答：“不！还是应当写叙事诗！你掌握的战争题材，时代赋予你的使命，太丰富了！不用叙事诗，不足以完成诗的使命！”

我没有再辩。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表情如何。但因思想未通，可能出现蹙嘴之类的形象。可是胡风这一观点如水银泻地，注入我年轻幼稚而贫脊的思想园地，使我长期独自地进行反复思辩。

说着说着，有两人进来喊他。显然是村干部找他谈工作。我突然醒悟，一看表，已经五点多了！吉普车还在五里外的小镇上等我。这天夜晚，我还要主持一个记者会，布置明天的工作，明天就得出发了。我立即告辞。临别时，他把坏了的手表交给我带到城里修一下。我把我的表给他，他坚决不要，说：

“时间对于军人特别重要。”

“不！”我纠正他，“时间对于每个人都重要。农村不也一样？”

“农村不要紧。快走吧！你现在的的时间特别紧，要赶路，注意安全！”

他那巨大的手紧紧握住我，说：“不要再来了，交通不便。有空，通通信。我冬天回北京。在北京见。”

分手之后，我脑子断续地闪亮着几个字：

时间，安全，巨手……

果然如他所说，1951年的冬天，我和他第二次见面在北京，他住在煤渣胡同二号，《人民日报》宿舍。1953年，他由上海搬家到北京。我也是1953年由重庆调到北京的。在北京期

间，虽见面多次，但学术气氛一次比一次淡漠，政治气氛却一次比一次浓烈。终于政治气氛代替了一切，淹没了一切。

什么都淹没了？

也是。也不是！

二十五年的风暴过去了，而第一次见面的音容谈吐，清晰如昨。任何气氛和风暴，淹不掉也冲不掉我对诗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胡风同志逝世之后，我常展开他最后亲笔写给我的信，以寄哀思。这信最后的几行是：

我生活不能自理，写字都不容易，

空劳同志们的关心。

特致怀念不已之情，握手！

胡 风 84 年 5 月 27 日

我每读到这些颤抖着的字体时，泪如涌泉，总想捧头痛哭一场！

历史是有情的，然而也是无情的！

自从 1985 年 6 月 8 日以后，再也不能紧握诗师的巨手了，而“怀念不已之情”，是永世难忘的！

接梅志兄告知胡风追悼会即将举行的航
信后的第二天，草于西安吉祥村两仓楼

1986 年 1 月 4 日

原载《胡风论诗》